

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之演进

□ 诸葛忆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一、两汉察举制与游子思妇题材

先秦时期,古代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都在萌芽、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初始期。西汉确立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即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西汉建国,便建立起察举制大致框架。而后,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察举制逐渐完善。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至此,西汉察举制基本完备,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

察举制度之下,士人除才学能力之外,关键需要让外人熟悉自己的声名或才能,方有机会获得荐举。寒窗苦读,面壁十年,与世隔绝,就完全不可能获得荐举的机会。士人必须通过相当的方式,弘扬声名,引起关注,其中,游历与拜谒就成为主要手段。这样的风气,自武帝以后开始蔓延。东汉以后,此风愈炽。世风日下,察举变味,其间充斥着营私舞弊,《抱朴子·审举》云:“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于是,游历拜谒、疏通关系、借助外力成为士人第一要务,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应璩诗云:“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

明了两汉察举制下形成的士人热衷漫游之世风和“处士纯盗虚名”之士风,就会对《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有更加深入的体会。《古诗十九首》的核心话题就是“游子思妇”,正是这种“冠盖填门,儒服塞路”之奔波劳顿的心路历程之展现。《古诗十九首》反复吟唱着这一主题:“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游宦途中,他们当然会表现对功名利禄的极端热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得不到荐举,他们就会有种种怨言:“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或者会有知音难觅的感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长年游历拜谒失败,又会产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等颓废情绪:“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再将视野拓展到两汉其他文学创作,游子思妇也是最为常见的主题。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题与《行行重行行》完全一致,开篇即云:“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文选》所载七首所谓李陵、苏武诗,主题皆为游子思妇,所谓“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如云:“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之送别,“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之相思,皆情真意切,入木三分。

二、六朝九品中正制与玄言山水题材

黄初元年(220),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朝廷设置各级中正官,专门负责品评人物,品评的最主要标准是家世门阀,同时要顾及个人行状,所谓“家世”和“德才”,以九品确定人物。九品中正制背景下,门阀和品评成为选官的两大要点。门阀是确定的,品评却有高低优劣之分。六朝知识分子围绕着品评,就会有系列的作为。即:人们以当代盛行的世风和士风来品评人物。六朝士人,由此趋同当代世风与士风,文学创作特色也因此形成。

六朝盛行玄言清谈,魏晋时期,距西汉“罢黜百

家”时间较近,儒家在思想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还未牢固树立。竹林七贤等士人以老庄玄学对抗司马氏,外庄内儒,儒家在某种程度上退居次位。两晋时期承袭此风,老庄玄学继续盛行。由此,善玄言清谈者易得美官。崇尚玄言清谈,很快对文学创作形成影响,西晋后期玄言诗逐渐流行。《文心雕龙·时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屯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老庄的志趣乃清静无为、回归自然,故其倡言隐逸,偏重山水。于是,山水风景在玄言和士人生活中就占有相当的位置。况且,玄学家认为自然界的现象和变化都能体现“道”和“理”,或者干脆就是“道”和“理”的衍化派生。所以,两晋士人谈玄时,往往借助山水说明理趣。孙绰《赠谢安诗》云:“幽源散流,玄风吐芳。芳扇则歇,流引则远。朴以凋残,实由英翦……青松负雪,白玉经飏。鲜藻弥映,素质逾昭。”便有借景说理之意。

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中言山水风景的句子颇值得吟咏回味,故六朝士人酷爱山水。而且,“散怀山水,萧然忘羈”,正是魏晋名士风流之一种。六朝士人几乎所有的审美热情,都在山水之间得到了释放。除了玄言诗中时时点缀的山水句子之外,其他文体中多有山水描写。尤其是相互之间的通信,不乏全篇都写山水者,如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等。

谢灵运山水诗大都以玄言结束,前文的山水景色都成了最后玄言之印证。其《登池上楼》从“潜虬媚幽姿”到“褰开暂窥临”,都是诗人在叙述自己生活的现实情景。“倾耳聆波澜”至“园柳变鸣禽”六句才是山水描写,最后用以证明“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之玄言。谢灵运诸多山水诗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其《登江中孤屿》结云:“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结云:“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结云:“观此遗物处,一悟得所遣。”甚至陶渊明部分田园诗,也不脱此种模式。《饮酒》其五结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园田居》其四结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连雨独饮》结云:“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玄言为主体,山水为点缀,即是玄言诗;山水为主体,玄言为点缀,即是山水诗。玄言与山水,乃一奶同胞,都可以追溯到世风士风、人物品评、九品中正。

三、唐朝科举制与诗歌题材的全面拓展

唐朝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首先,唐朝科举制之考试内容和录

取重点的改变,导致唐诗创作的全面繁荣。具体地说,唐朝进士科“以诗取士”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唐诗繁荣的进程基本一致。唐初进士科,仅试时务策。《通典》卷十五载:“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试文”或称“试杂文”,最初并不确定文体,《登科记考补正》卷二按云:“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一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所试“杂文”两篇,才逐渐确定为诗与赋。其时,甚至有“赙帖”一说。《封氏闻见记》卷三载:“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赙帖。”帖经也被试诗所替代,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和录取重点至此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即:进士科考试惟重诗赋,是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形成的。

盛唐诗歌创作高峰,正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不是一种巧合。转换到科举制度演变的角度观察唐诗兴盛史,就会有独到的认识。唐朝不到三百年,初唐诗坛约百年时间,占1/3强,而著名诗人寥寥。初唐有王绩、初唐四杰、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等,东晋南北朝也有谢灵运、陶渊明、鲍照、谢朓、庾信等等,两相比较,初唐诗坛之繁盛并未超越前代。唐初科举制进士科考试不考诗赋,对文学创作几乎没有影响,诗歌创作大致沿袭前人,其成就亦无法超越前人。开元、天宝年间,唐诗创作进入全面繁盛的阶段,人称“盛唐”。李白、杜甫、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盛唐边塞诗派,一时风起云涌,诗人林立,名篇迭出。这与进士科考试内容与重点的转移大致同步。

其次,唐朝科举制下形成的纳卷、行卷制度,最大程度地推动了诗歌创作之繁荣。唐朝科举考试没有弥封制度,考官直接面对考生。同时,仅靠考场短暂比试而决定考生前程的方式确实也存在不合理性。为了弥补科举考试过程中此种不足,天宝元年(742)礼部侍郎韦陟知贡举,针对性地采取了“纳卷”的措施。《旧唐书》卷九十二《韦陟传》载:“陟好接后辈,尤鉴于文。虽辞人后生,靡不谙练。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此后,朝廷效仿这种做法,大约在天宝年间形成制度。

“纳卷”制度依然有两个不可避免的弊病。第一,唐朝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每人选优秀作品十多首,总共就有一万多首作品。让主试官

在有限的时间内,认真读完这么多作品,并加以甄别,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第二,如韦陟这样“尤鉴于文”的主考官毕竟不多。考生因此自寻出路,“行卷”应运而生。“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与纳卷、行卷等相关,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公荐”、“通榜”等做法。即: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向主考官公开推荐考生,考前就决定录取名次。“公荐”和“通榜”的依据,就是考生的行卷。考试名次,往往考前决定。在如此科举选官制度背景下,唐人不会写诗,便是自绝前程。年年投考,需要不断纳卷和行卷。李商隐《与陶进士书》描述自己当年赴考经历,云:“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岁岁纳卷、行卷,必定有新作补充更替。所以,唐人需要不断写诗,乃至终生殚精竭虑,努力推陈出新,打磨出精品。中唐“苦吟”诗风之形成,即得力于纳卷与行卷之风。

四、宋朝科举改制和文学转型

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个方面:其一,建立起弥封、誊录、编排、锁院等制度,确保以考试卷面成绩为录取依据,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考场公平公正原则之落实。其二,考试内容从重诗赋转向重策论。

糊名,又称封弥、弥封,即糊去试卷上考生姓名等个人信息,以号码作为试卷的编号。与此相关,朝廷派遣专门人手,将考生试卷重新抄录,以免考生笔迹被认出,此为誊录制。与此关联,又有编排制、锁院制等。编排,指弥封过程中的编号。锁院,指朝廷公布考官名单后,考官们立即进入考试场所——贡院,不再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才离开贡院。考官无法知晓考生姓名,纳卷、行卷、公荐等制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宋代科场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努力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的种种影响,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宋代士人由此转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之闭门苦读,反复揣摩试题类型,模拟写作。闭门不出,就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阅历,缺乏创作的激情。宋人再也不需要时时面对现实生活,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宋人共同将唐宋诗创作成绩的差异归之于科举制度。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杨万里亦云:“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无他,专

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

宋太宗以后,大量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考试内容与为官品质和资质之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朝廷上下的关注,宋人开始不断质疑“诗赋取士”。孙何言:“策论高者,稍近于仁义;诗赋精者,未离于雕篆。今朝廷取士之制虽古,用道较艺之术,犹专守唐代。”既然诗赋与官员的道德品质、行政能力无关,策论一步步获得朝廷重视之后,要求独重策论的讨论也就出现了。范仲淹庆历年间变革朝政,对科举的要求也是“先策论而后诗赋”。神宗熙宁变法,科举改革乃其重点之一。王安石认为:“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诸人所议,大致相同。皆以为科举应该罢试华靡不实之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熙宁三年(1070)进士正奏名和特奏名殿试,首次采用制策问答的方式考试,其做法与以往的制举殿试相同。殿试应策,全篇议论,宋代科举由唐人的“以诗取士”转向“策论取士”。在这样的科举风气转移背景下,宋代文学好议论的特点逐渐凸显。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苏轼诗歌,即说:“子瞻以议论作诗”。《沧浪诗话》称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对这种创作风气转变的经典归纳。宋诗中议论名篇名句比比皆是。范仲淹《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云:“一棹危于叶,旁观亦损神。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王安石《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苏轼《题西林壁》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陆游《关山月》云:“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其实,具体到宋人的散文,其喜欢议论的成分也要远远超过前人。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旨趣在山水风景,个人的情感或心境也总是通过山水景色的描写折射出来。宋代的山水游记,往往喜欢通过景色浏览来揭示一种理趣。如苏轼的《石钟山记》最后得出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最后引发出来的也是大段议论,通过观赏景物等游历,明白的也是人生哲理。

即使花前月下以抒情见长之宋词,也不乏议论名句。柳永《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苏轼《念奴娇》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秦观《鹊桥仙》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至辛弃疾更是形成“以文为词”的创作特征,将议论手法在歌词创作中运用得淋漓尽致。

明清科举制度沿袭宋朝,进士科考试内容由经义、策论转向八股,与文学渐行渐远。

■ 《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约19000字